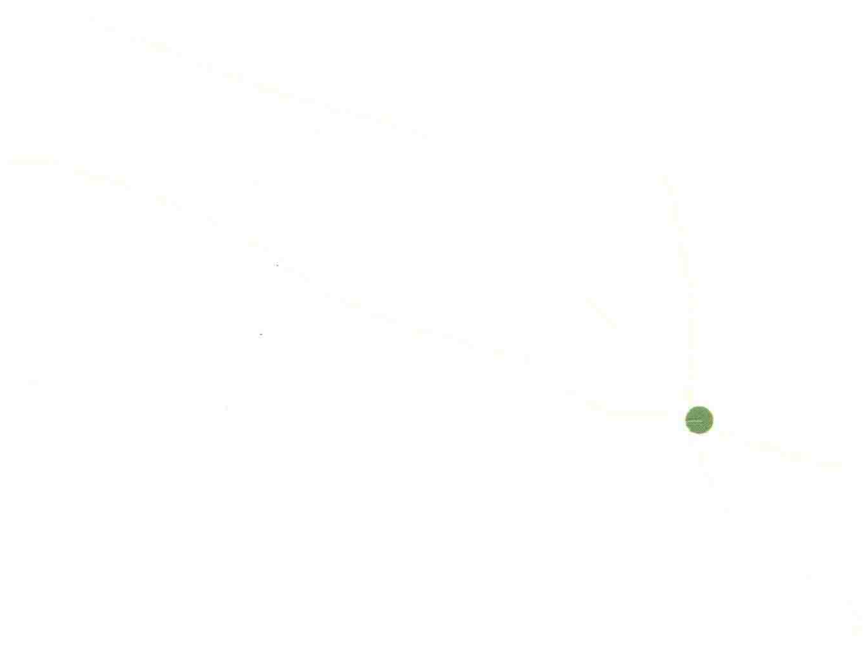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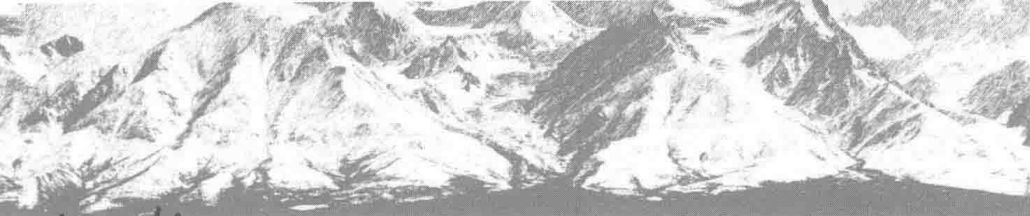
三江源生态移民的 文化变迁与身份认同研究

——以格尔木昆仑民族文化村为例

付海鸿◎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三江源生态移民的 文化变迁与身份认同研究

——以格尔木昆仑民族文化村为例

付海鸿◎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与身份认同研究: 以格尔木昆仑
民族文化村为例/付海鸿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161-9036-4

I. ①三… II. ①付… III. ①移民安置—研究—青海
IV. ①D6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761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

生态文明的人类学意义

徐新建

引言：甲居故事——敬神路上的环保者

2008年8月6日，藏历六月初五这天，更登格玛很早就起来了。

前一晚的雨水把远近的山景冲洗得格外清新。白云环绕，朝阳照在高低错落的山地藏房和玉米地里，四处泛着各种颜色的斑驳亮光。坡上坡下，寨子里已有人家开始在屋顶“煨桑”——向四方神熏烟敬献。青烟升腾，传递着人们对自然神灵的虔诚敬意。收完家里的花椒后，更登格玛带上两个孙女，和村里亲友结伴上路，踏上了前往顶果山的转经朝圣之路。



图1 甲居山寨（徐新建摄）

同一时间里，甲居一、二、三村的日俄阿美、拥忠贝姆和曾明福等村民也乘农闲时节，沿不同的路线投身于各自的朝神之路。她们去的地方，分别是村后的亚霄神山、县城附近的白噶神山和大金川岸边的烧香炉……

在当地传统中，每年藏历六月都有规模超过平时的转山朝圣。甲居藏寨在大渡河上游，隶属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在当地藏民心目中，自然有灵，神山无限，于是在日常生活里便时刻敬山，年年朝圣，爱护众生，尊重自然。丹巴一带的朝圣转山，有一个四方汇聚的核心：金川河岸的墨尔多神山。作为众神之首，墨尔多神山有着包括亚霄山、白噶山和思古勒山（四姑娘山）等诸多护卫山在内的完整体系，范围广远，次第分明。这种族群地方性知识的影响，使墨尔多周围广大区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持续至今的世代守护。

一 生态恶化与文明问题

然而当我们把视野转到这些神山之外的“发达”地区，生态恶化的情景触目惊心。以下是官方媒体的统计报道：

国家林业局、中国水网——

中国仍有沙漠化和严重沙漠化趋势土地面积 44.3 亿亩，占国土总面积的 30.58%；中国水土流失土地的总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对耕地安全和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全国有 15%—20% 的动植物种类濒危，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物多样性锐减困扰着中国。一方面，全国正常年份缺水 400 亿立方米，400 余座城市供水不足；另一方面，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严重。^①

新华社——

2006 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不降反升，环境事故居高不下，国家环保总局应急中心共处置环境事件 159 起，是 2005 年的两倍。^②

《人民日报》——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增加较大的食品加工、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5 个行业，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率为 67%；二氧化硫

^① 据中国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雷加富在“2007 森林生态保护（伊春）国际论坛”上的发言。另参见“中国水网”：《刍议水资源危机及措施》，http://news.h2o-china.com/interview/expert/654191197507967_1.shtml。

^② 参见曲格平《单位 GDP 能耗降低目标未实现 责任在领导人》，原载《经济参考报》，转引自新华网 http://www.ah.xinhuanet.com/swcl2006/2007-02/14/content_9308929.htm。



排放量增加较大的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5个行业，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率为84.4%。^①

国家领导——

人口增加、生态恶化所造成的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我们的面前。^②

面对如此严峻的境况，中国的主流媒体坦承：“这意味着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③可喜的是，在长期回避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中国社会尤其是决策者们终于承认生态恶化的原因与人类行为即不当的开发方式有关，于是转过头来反思并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型目标。

从人类学角度看，生态恶化确与人类文明有关：所谓“不当的开发方式”，标志着文明出了问题。自然是超人类的存在，生态具有自调整 and 自循环功能。只是由于人类干预，自然的均衡才被打破，生态的循环才面临危机。在此意义上，文明自其初始便具有反自然的特性。自然包容万物，进而使人类成其部分；文明改造、排斥自然，欲使自然变为人类的部分。于是从本质上说，持续至今且日趋严峻的生态恶化，就是文明与自然的冲突。

西语中的文明一词 civilization，其本意之一是城市化。这既意味着走出自然、改变自然，又暗示着人类的自我中心思想。这种核心理念蔓延至今，便催生了从工业革命直到全球现代化的一系列社会巨变，并引

① 刘毅、孙秀艳：《“十一五”环保形势严峻 污染排放为何不降反升》，《人民日报》2006年12月28日。

② 温家宝在国际农业科技大会上的讲话，摘自《农民日报》2001年11月10日。

③ 参见《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0日。

发了遍及世界的环境污染、气候异常和生态危机。如今作为后发达地区的中国，在避免危机的路途上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态文明呢？

二 多元文化：中国西部的生态遗产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并拥有帝国兴替的悠久遗产。在应对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共和国境内的自然风貌和族群传统，一直呈现并提供着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交错并举的丰富格局。若以东、西两部分作简要划分的话，如今提出的“生态文明”，在东部相当于重建，对西部则是保护和复苏。这就是说，由于自然条件与人文信仰等方面的显著差异，西部长期保有与东部不同的生存方式及环境类型。

根据近来的划分，中国西部包括从内蒙古东北角到云南省西南边陲 11 个省区的辽阔区域。其生态多样、民族多元，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联系帝国更替及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来看，无论在自然还是文化的意义上，中国东西部分界的意义丰厚而深远。



图 2 十五英寸雨线示意图



这条分界既与“15 英寸等降雨线”及农区与草地等自然地理界限大致吻合^①，又同古代长城、“半月形文化带”^②等的走向密切相关，同时还契合了近代西化浪潮和中国政府实施“梯度开发”时均呈现的历史和空间的等级阶序，即从东向西，由外及里。



图3 中国农区、草地分布图

也正是这种从东向西、由外及里的近代阶序，一方面打破了古代中国千年承继的农牧两区大致均衡的文明风貌，致使被土地捆绑的“乡土中国”率先解体，使诞生了“四十个世纪”农耕文明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③；另一方面却使相对现代化、工业化而言处于“落后”地位的西部草原和山地，在人口稀疏的前提下保持了世代延续的生态文明。

① 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27页。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卷，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603页。

③ 参见金恩《四千年的农民：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有机农业》（F. H. King,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ganic Farming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 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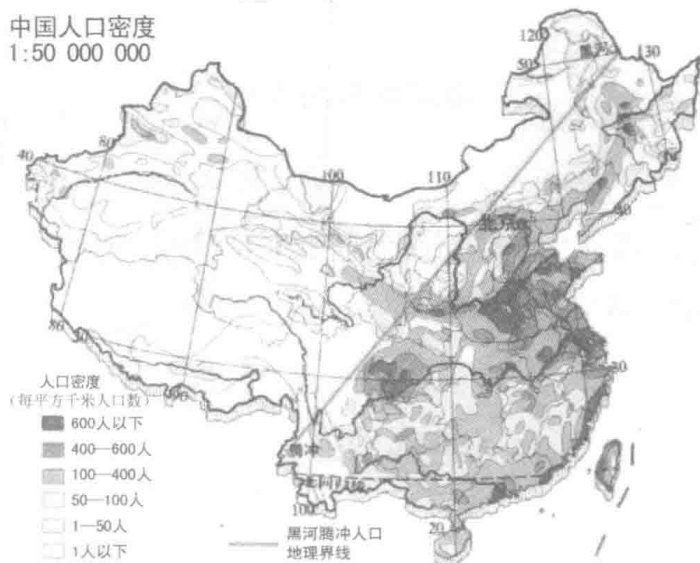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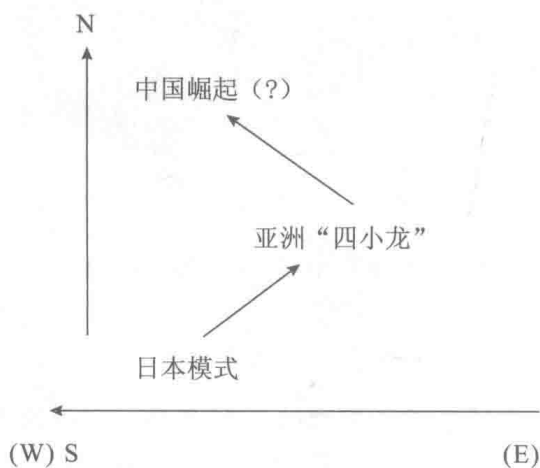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人口分界线（“胡焕庸线”）

传统上，西部的生态文明是在敬重自然、维系环境基础上的循环经济，即受到如今经济学家称赞的三R类型——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和减量化（reduce）。其特点是无论放牧驯养还是采集耕耘，都不越过自然的限度，同时坚守着族群自身的信仰制约，从而保证了诸多民族在此区域内历史性的可延续。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文明类型还为夷夏互补的整体中国留下了异常珍贵的生态文明遗产，从而为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和发展困境提供了难得的回旋余地。我们把中国西部传统的族群方式视为“生态文明”，意味着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学进步。它扬弃了以往把“非华夏”“非中心”及“非西方”地区视为“野蛮”“蒙昧”的偏见，在复数文明的新思维下反思自我，找回过去也曾拥有过的自然和谐。这不仅关系到西部族群和未来中国，还将影响现代化进程中的东亚走向。



三 中国崛起与东亚转型

从整个东亚范围与“现代化”进程来看，多元中国的未来选择具有深刻的地区效应。如下图：



(说明：N=北方；S=南方；W=西方；E=东方)

图5 中国的未来产生的东亚效应

在近代以来的亚欧互动中，东亚先后出现了日本模式和以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四小龙”类型。尽管前者一度堪与西方媲美，号称“日本第一”，后者因其腾飞奇迹而被归结为有别于欧美新教模式的“儒家资本主义”，但相比之下均与具有帝国传统的中国颇为不同。其中最突出之处在于中国——或者称夷夏之邦，不仅规模超大，并且无论在地理、生态还是族群、历史方面都具有突出的多元特征，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则表现为相对明显的同质和单一。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将以何样的模式出现，更“东”还是更“西”？更“北”还是更“南”？

眼下，伴随着“改革开放”成果的三十年积累，中国的领导者正部署一场自上而下的大国崛起。对于中国崛起的前因后果，各界反应不一。有人试图由此重新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将其定义为“儒家社会主义”^①。然而这样的看法是有局限的。其既没有理解“中国”的完整含义，亦未能显示“共和”的历史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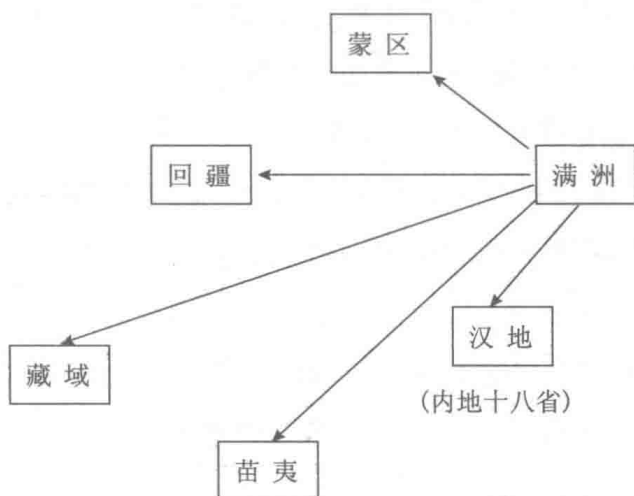


图6 帝国遗产：从五族共和到多元一体

回溯近代中国的王朝更替，共和的基础源自清帝国的五族关联，即以满洲为主的满、汉、蒙、回、藏等族群共同体及其对应的帝国疆域。在此疆域中，由于大体维持“以夷制夷”传统、采用区域分治的策略，帝国维持了较长久的族群多样与生态均衡，并拓展了具有缓冲和弹性的周边关系。结合今日的生态危机和文明走向来看，正是这种帝国遗产为可能的东亚转型留下了多样的空间与另类的资源。

近来有日本学者从“文明生态”出发，把古今中国称为在王朝更替中保持连续的“中华文明圈”，并给出如下判断：

^① 参见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甘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其主干是儒家为主……”



中华文明圈由于与印度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在地形、地理上分隔开来,加上其超级大国与周边的小卫星国的关系,以及朝贡贸易形式的软构造关系的特殊性,才保持了安定的空间。并且,所谓的中华文化虽说汉族承担了多数的责任,却决不是汉族的专有物,而是多个种族、民族交融形成的混合文化。^①

这样的视野至少还原了中国特有的内外结构。由此而论,今日“中国崛起”所要协调的基本问题至少包含三个维度:(1)中国与西方的竞争;(2)中国与东亚的转型;(3)中国内部——亦即“夷夏”之间的互补共生。但目前的趋势不容乐观:自20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来,随着单一发展模式不断向各地推进,中国的地区与族群多元性与日锐减;2000年之后,由“西部大开发”引起的资本西进,更因片面追求高速增长和短期效应,不仅动摇了所至之处本土族群的世代传统,且由于破坏当地既有的自然均衡使之变为生态脆弱地区,从而开始威胁整个国家的环境安全。

所幸代价终能让人清醒。1998年,长江流域大面积的特大洪灾促使政府出面,启动了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主的长江上游地区的“天保工程”(天然林保护)。这样的举措,意味着对半个多世纪来国家在当地长期砍伐的终止和反省。2008年突发的汶川大地震惊动举国。在救灾重建的同时,有科学家经过反思,指出震因与近年来众多企业竞相在当地大小河流几无限制地筑坝发电不无关系。^②

^①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李云雷译,《比较文学研究通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2002年版)。在该文中,作者还指出认识中华文明圈时视点移动的意义,指出“例如面对着敦煌文书的时候,有必要将视点向北移到突厥,向南移到吐蕃,向西移到西域的伊斯兰教王国来关注敦煌”。

^② 参见范晓《汶川大地震:地下的奥秘》,《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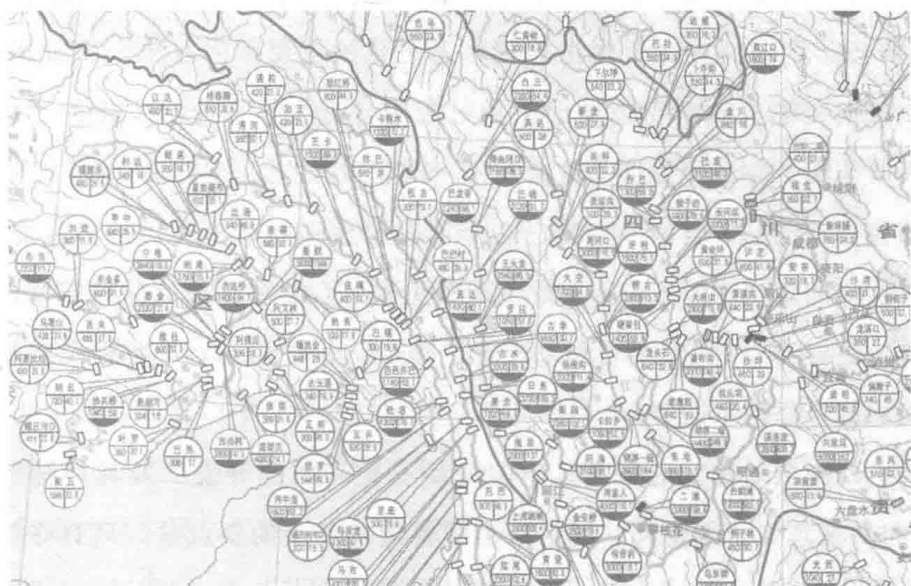


图7 超常密集的西南水电开发图示^①

如今汶川大地震的伤痛逐渐抚平，中国需要再次面对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危机，力争通过生态平衡与文明调整，成为担当族群多元、地区互动及人类共存重任的大国。为此，就目前的社会机制看，这样的目标单靠国家难以实现，还需要更为广泛的学界参与和社会动员。

多年来，人类学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异文化”研究，并经历了从以进化论为前提将不同民族作“文明”与“野蛮”之分，向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基础提倡族群尊重的演变。如今又拓展出反思“我族中心”缺陷，向“土著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寻找理论以救治现代性的重要转向。^② 2004年，中国的部分人类学者聚会银川，针对

^① 相关资料可参阅2007年9月27日《南方都市报》的《水电开发“搞垮”西南生态》，以及《南方周末》记者2008年4月10日发自四川、云南的报道《西南水电为何疯狂》。

^② 相关论述可参见笔者另文《文明对化中的“原住民转向”：兼论人类学视野中的多元比较》，《中外文化与文论》2008年总第17期。



人类的“发展困境”展开讨论并发表呼唤从文明生态走向生态文明的《生态宣言》。《宣言》指出当代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破坏,因此期待在关注“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族群文化的“敬天”传统,并为此更加尊重世界和一国范围内的文化和生态多样性。^①值得庆幸的是,类似的期待已在甲居藏寨这样的草根底层转为现实。在这样的转变中,不仅有百姓们默默无闻的身影和传统信仰的深厚积淀,也有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和 CI(保护国际)等各种民间组织竭诚合作的不懈努力。

回到东亚转型的角度,中国的新一轮“西部开发”及其伴随的“和平崛起”意义重大。其中一个需要谨慎展望的要点是,只有守住西部的生物与文化多样性才能守住多民族大国的生态多元,进而才能确保东亚地区的发展多样性乃至国际社会的“和而不同”。

四 民族文化的生态意义

藏文史书《第吴教法史》有载:“天有天神、水有水神、林有林神……世界万物中皆有神灵存在。”^②

墨尔多神山位于大小金河之间,南北走向,在马尔康、丹巴、大金、小金等县境内伸展,连绵数百公里,山势险峻,村寨蜿蜒。据当地藏文文献记载,神山中心“宛如伞盖的骨架向四周延伸,撑着六十五座神山”。作为自然神的代言人,神山威力无比,因而若“围绕

^① 《宣言》指出:“‘生态危机’导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其直接原因出自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的核心是‘制天’,即对生态系统的盲目征服和粗暴改造。”参见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生态宣言:走向生态文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参见周拉《略论藏族神山崇拜的文化特征及功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神山转一周，相当于念经七亿遍，来生不得下地狱，今世也得消灾难……”^①

2008年藏历六月十一（8月12日），更登格玛一行又从甲居出发，去往西北一百多公里外的塔公草原，到著名的塔公寺转山朝神。与顶果山和墨尔多神山的庙宇分别有苯教及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传承不同，塔公寺属于红教，即藏传佛教的萨迦派。不过对于更登格玛这样的普通村民而言，教派之分并不重要。她们之所以不辞辛劳地坚持周期性朝神，是因为对自然神灵的敬畏，以及对解脱和来世的信仰。那年转山时，日娥阿美对我说转山的次数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每处至少要去三回：一为父亲，二为妈妈，第三回才为自己……这种敬畏和信仰，一方面塑造了她们的生命目标与日常行为，另一方面使与之相关的山山水水得以久存。

近年来，“保护国际”（CI）的成都项目部组织志愿者深入丹巴藏地，力图借助当地民众的信教传统与活佛魅力开展保护生态的宣传及实践。他们启动的“神山圣湖”计划初获成效，正好印证了中国西部多民族地区“生态文明”的深远潜能。

对照中国面临的危机和拥有的机遇，甲居的意义在于敦促人们深思：是盲目追求黑色GDP，还是冷静保持生态和谐与绿色CE（循环经济）？是在经济增长的路上无限扩张，还是通过精神信仰使世俗欲念有所约束？是驱使十多亿国民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都奔向同质而单一的增长，还是在大国的传统中保持从自然到文化的多元一体？

^① 参见政协甘孜州委员会编《墨尔多神山志》（汉藏对照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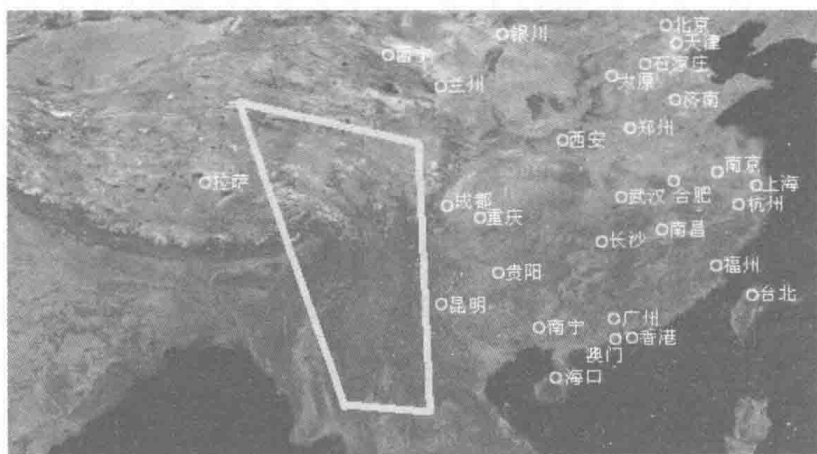


图 8 甲居所在区域与中国西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脆弱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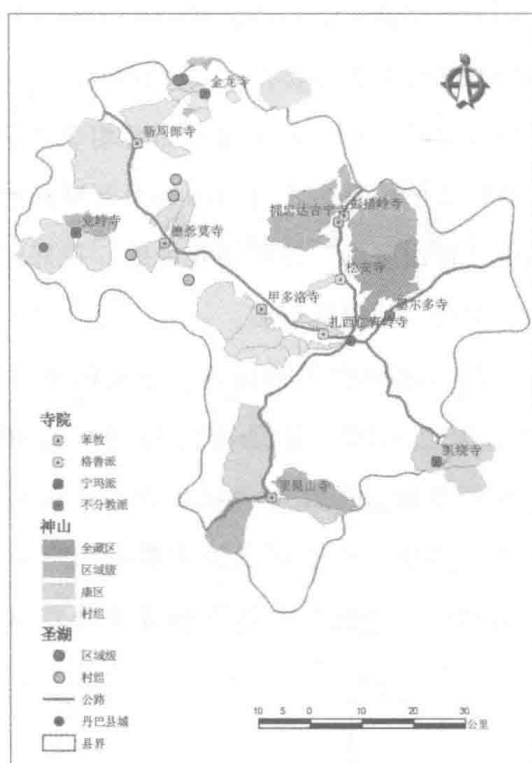


图 9 丹巴县神山神湖位置示意图^①

① 资料引自申小莉《康区藏区神山圣湖状况调查》(打印稿)。